

中共“一大”研究论文集

(1980 — 2010)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 编

上海辞书出版社

中共“一大”研究论文集

(1980—2010)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 编

上海辞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共“一大”研究论文集:1980~2010/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编.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8

ISBN 978-7-5326-3477-4

I. ①中... II. ①中... III. ①中共一大(1921)—文集 IV. ①D22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48654 号

责任编辑 竺金琳

装帧设计 柴敏

中共“一大”研究论文集(1980—2010)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上海辞书出版社

(上海市陕西北路457号 邮政编码 200040)

电话:021—62472088

www.ewen.cc www.cishu.com.cn

常熟文化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28.5 插页 2 字数 421 000

2011年8月第1版 2011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6-3477-4/D·105

定价:58.00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联系电话:0512—52219025

中共“一大”研究论文集编辑委员会

主 任：倪兴祥

副主任：张小红

编 委：倪兴祥 张小红 徐云根

任 锐 信洪林

主 编：徐云根

前 言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下简称中共“一大”)的召开,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国革命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

由于中共“一大”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特殊地位和作用,因此中共党史学界历来十分重视对中共“一大”的研究。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贯彻和落实,随着中外文史档案保存机构对中国共产党早期历史相关文献资料不断的新的披露,海内外许多中国共产党党史专家,围绕中共“一大”研究发表了不少新的专著和论文,取得了许多新的学术成果,推动了中共“一大”研究的深入和发展。

但由于中共“一大”是在秘密情况下召开的,党成立以后又经历了长期的白色恐怖和战争年代,因此有关中共“一大”的原始文件和详细记载都未能完整保存下来。而与会议有关的当事人的回忆,又大都是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写的,相隔时间较长,加上各自经历、角度、观点不同,回忆的史实不但欠翔实,而且不尽一致,甚至相互龃龉。即使同一人的回忆,因为历史条件的变化,先后也会有不同。因此,30多年来许多专家、学者在中共“一大”专题研究上虽广征博引,辛勤耕耘,成果累累,但也争论不断,众说纷纭,某些方面至今仍难有一致的结论。为了给广大专家、学者深入探讨中共“一大”的有关问题搭建一个学术交流的平台,进一步促进中共创建史的研究;为了更好地发挥革命纪念馆在研究、宣传党的光荣历史和革命传统中的重要作用,我们特编辑出版了这本《中共“一大”研究论文集(1980—2010)》。

这本论文集紧紧围绕中共“一大”尚存争议的相关问题,分为“会期与会

址”、“代表人数与资格”、“议题及争论问题”、“会议文献”、“领导机构”、“代表研究”、“合论”、“研究综述”8个部分,共收录自1980年至2010年期间,公开发表的有代表性的论文58篇。为了保持论文的原貌,除个别错别字外,我们对原作基本不作改动。这些论文发表的时间有早有晚,论文作者的社会知名度有大有小,论文的研究程度有深有浅,观点也不尽一致,我们选编收录的标准是:论文必须有史料根据,有理性分析;论文的观点必须鲜明,能自圆其说,并有一定的代表性。我们认为,对待历史研究上有争议的问题,不能谁有权听谁的,也不能谁有名听谁的,只能是以史实为依据,在平等的争鸣中以理服人,并越辩越明。我们并不奢望通过这本论文集能弄清中共“一大”研究上所有尚存争议的问题。我们只希望通过这本论文集能给研究者和广大读者提供一个了解中共“一大”研究的基本线索,引发大家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兴趣。如果能够为研究者和广大读者提供若干可资利用的历史资料和可供讨论的观点,能对深入研究带来一些新的启发,我们就会深深地感到满足了。由于编者水平及能力所限,本书所选论文可能不尽全面和完善,挂一漏万在所难免,也希望读者见谅。

2011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诞生90周年纪念日。我们也想以此书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纪念馆——党的诞生地纪念馆的专业工作者献给党的重大生日的一份礼物。

倪兴祥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纪念馆馆长、研究员

2010年8月

目 录

前言	倪兴祥
----------	-----

会 期 与 会 址

关于中共“一大”预定开会时间的探究	李国继	3
中共“一大”的预定开幕日期探疑	李继华	9
中共“一大”开幕日期再考证	朱泽春	17
关于党的“一大”开幕日期问题的商榷	任武雄	28
中共“一大”8月1日闭幕考	沈海波	33
中共“一大”结束日期新探	王国荣	41
党的“一大”闭幕日期是8月2日	周子信	50
中共“一大”闭幕日期考订	王相箴	55
中共“一大”闭幕于8月3日	程金蛟	61
党的“一大”8月5日嘉兴闭幕考辨	曹仲彬	68
党的“一大”会址、会场考	范崇山	77
中共“一大”开幕式在博文女校举行的考证	陆米强	81
中共“一大”会址地址辨析	张玉蕊	84
党的“一大”会址被搜查之谜	任武雄	88
巡捕闯入中共“一大”会场新说	朱 华	91
中共“一大”会场被搜查之谜	[日]石川祯浩	96

代表人数与资格

对《关于中共“一大”代表人数的几种说法》一文的质疑	叶蠖生	101
对中共“一大”代表人数的新质疑	解光一	105
关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人数的探讨		
——与邵维正同志商榷	宫玉书	108
包惠僧出席中共“一大”身份问题考证	张 钟 陈志莹	121
对包惠僧中共“一大”代表问题的再认识	吴兴农	130
驳张国焘的一个谎言		
——关于何叔衡中共“一大”代表资格的考证	周子信	135
关于何叔衡是否终席中共“一大”问题	姜仲怡	139
何叔衡没有出席中共“一大”	陈 标	146
何叔衡是中共“一大”代表,但未出席中共“一大”		
——兼论出席中共“一大”的代表是十二人,不是十三人	冯铁金	149
试谈李大钊未能出席中共“一大”的原由	俞兴茂	162
李大钊、陈独秀未参加党的“一大”之原因	郑天贵	165
李大钊未曾出席中共“一大”原因考	刘 钢	170
陈独秀没出席中共“一大”的原因	王其彦	175
“南陈北李”为何不出席党的“一大”	程金蛟	179
对出席中共“一大”代表的几个判断	张 利	186

议题及争论问题

党的“一大”议题初探	邵维正	195
中共“一大”上不同政治观点之争	褚家渊	208
中共“一大”上毛泽东是否反对了“左”、右倾思想考	周一平	212
中共“一大”并未采用民主集中制	管怀伦	223

中共“一大”为何没有采纳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革命思想

..... 张文琳 吕建云 233

会 议 文 献

《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俄文本的来源和初步考证 李 玲 243

试论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的制定 王学华 247

中共“一大”政治纲领初探 王相箴 257

中共“一大”纲领第十一条是民主集中制 管怀伦 266

中共“一大”党纲研究 谢荫明 275

中共“一大”文献辨析二题 李玉贞 289

领 导 机 构

关于中共“一大”成立的中央领导机构 朱汉国 303

中共“一大”会议产生的中央领导机构再考证 朱泽春 307

中共“一大”后中央领导机构考实 王健英 314

周佛海曾在中共“一大”上担任党的中央局代理书记 倪兴祥 319

代 表 研 究

中共“一大”代表特点初探 蔡双全 杨秀林 325

张国焘为何成为中共“一大”会议主持人 苏 杭 333

马林对中共“一大”的作用考辨 蔡文杰 337

尼柯尔斯基的照片与生平史料发现经过 张小红 344

合 论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几个问题的考证 李 玲 363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日期和出席人数的考证

.....	邵维正	369
关于中国共产党创立几个问题的辨正	苏开华	388
对中共“一大”目前尚有争议的几个问题的考证	曾长秋	398
中共创建史上的八大疑案	徐云根	406

研究综述

中共“一大”近期研究成果综述	李芳清	417
关于中共“一大”南湖会议若干问题的述评	张年瑛	426
近二十年来中共“一大”研究综述	张艳华	435

会期与会址

关于中共“一大”预定开会时间的探究

李国继

目前,史学界多倾向于中共“一大”未按预定时间召开而误期一个多月的说法。其根据是1921年下半年形成的历史资料《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以下简称《大会》)俄译文本(至今未见中文原件)中,“代表大会预定六月二十日召开,……各地代表直到七月二十三日才全部到达上海,于是代表大会开幕了”的记述。

经查考多方面资料,笔者认为,中共“一大”不是预定6月20日召开,也不存在误期一个多月才开幕的情况。《大会》中“代表大会预定六月二十日召开”的文字有误。

一、《大会》所载时间存在公历与农历混淆和翻译错误的可能

《大会》并非中文原件,而是译成俄文后保存下来的,成文日期、译者、作者情况不详。从文中未记载“一大”开幕、闭幕和会议过程的具体时间情况看,作者对大会具体时间的记忆是模糊的。由此推知,文件的成文日期当在“一大”闭幕后一段并不太短的时间里。这样,可能致使文中记载的开会的时间产生公历与农历混淆的错误。

经查对,1921年农历的六月二十,是公历7月24日,恰恰就是《大会》记载的外地代表齐集上海的第二天。这似不应当作偶然巧合。因为,一则早有史学工作者认为,《大会》关于“各地代表,直到7月23日才全部到达上海,于是代表大会开幕了”的写法,并不能使我们确认“一大”就是7月23日开幕,而更有可能是7月24日开幕,倘23日有可能开什么会,也只能算作预备会之类。二则,上海发起组向各地发出的开会通知,按当时日常通信书写日期的

习惯,在写明预定开会的公历日期同时,还应注明农历时间。倘若预定开会的公历时间是上面所述的7月24日,那么农历就是六月二十。由于当时许多人仍多习惯用农历计时和整十的数字更易记忆的缘故,《大会》作者在会议闭幕较长时间后,记忆中的农历、公历时间相混,把“六月二十日”这个较易记忆的日期误作公历,是完全可能的。

另外,也有可能在当年由中文原稿译成俄文的过程中,将7月20日误译成了6月20日。因为俄文的“6月”和“7月”分别是 *июнь* (音“尤尼”)和 *июль* (音“尤利”),二者仅差一个字母,读音又很相近,极易出现笔误或口误。即使翻译没错,在打印、校对的过程中,出现一个字母之误,也还是常有之事。

倘若《大会》一文中出现的失误是前一种公历与农历混淆,那么“一大”预定开会时间就应该是7月24日,这就是说“一大”是按预定开会时间准时召开。倘若是后一种错误,那么“一大”“预定”开会时间就是7月20日,这距《大会》一文讲的各地代表全部抵沪的时间7月23日,也即目前认定的开幕时间,只隔两三天,那么“一大”也基本上是按预定时间召开的。

二、外地代表接到的不可能是预定6月20日开会的通知

一般讲,到会议预定开会时间时,赴会人员应该基本到会,即使有迟到的,人数也不会太多,迟到时间也不可能过长,更不可能全部迟到。现已查实的情况是,当年6月20日之前,没有一个外地代表到达开会地点上海。11名外地代表(包括包惠僧)中,张国焘到沪最早,时间也已是6月底(或7月初);毛泽东、何叔衡6月29日才从长沙动身;刘仁静先在南京参加了两三天少年中国学会的年会,又在南京游玩两三天,然后于7月6日前后到达上海。其他代表也都在张国焘之后才陆续到达,最迟的晚至7月23日。

按“预定6月20日召开”的说法,外地代表全部误期,有的竟晚到一月有余。此种情形,确属罕见。“一大”之前,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多在积极发展组织并翘首以待全国代表会的召开,都亟盼尽早建立全国性组织,以统一各地小组的行动。从个人情况看,这批代表大多数并非习性散漫或对召开“一大”持消极态度的人,而延搁赴会时间,“姗姗来迟”。细细考察他们各人的赴会

行期及这前后的行踪,只能认为,所有外地代表接到的不可能是预定6月20日开会的通知。否则,全都误期就无法解释了。特别是北京方面的代表,与上海之间一向联系紧密,交通、邮政也较有保障,又负有先期到沪参与筹备会议的责任,更没有误期到沪的理由。

三、从各方面情况看,当时不具备“预定6月20日开会”的条件

党史界确认,当年上海发起组向各地发出开会通知,是在第三国际代表马林6月3日到达上海之后。从6月3日到“预定”开会的6月20日之间,只有十六七天时间。

首先,马林与李达等人会面有一段过程。他6月3日到沪后,因为首次来华,地理不熟,语言不通,情况不明,加上又是国际反动势力“密切注意”的“赤色分子”,不得不秘密、谨慎行事。他先于4日“前往荷兰驻上海总领事馆办理手续”^①,取得在华活动的“通行证”,又同先期到沪的“赤色工会国际”工作人员弗兰姆堡接上关系并从弗处了解了有关中国共产主义者的种种情况^②。接着,通过弗再跟与他同一天到沪的第三国际远东书记处派到中国的尼柯尔斯基建立联系^③,然后才与尼柯尔斯基一同与李达等人会面^④。第一次会面似未就召开一大商定计划,因马林“与李汉俊及李达第一次见面就谈得不大投机”^⑤,后来他们又几次会晤^⑥,然后才由李达、李汉俊分头写信,向各地发出开会通知。完成这样一些过程,少说也需三四天时间。那么,通知开会的信件最早也只能在6月7日之后从上海发出。这时距“预定”开会的6月20日只有十二三天时间。

从当时的交通、邮政状况看,上海与北京、济南、武汉间较便利,但与广州、长沙、日本间则距离较远,又基本依赖水路交通,邮件也都靠客轮带运。上海至广州间海路单程需时快时四五日,慢时八九日,邮件一般十天左右送达,如遇别的情况,再晚三五天送到也是常有之事。上海至长沙、日本的联系、来往也需时较多。若发往广州、长沙、日本的邮件都按正常情况十日内左右送达,在“预定”开会的6月20日时,三地也仅刚刚收到通知。另外,上海发起组向各地发开会通知时,还在第三国际资助下,给外地代表汇寄了路费,汇

款比信件送达的时间还略慢一些。各地收到通知和汇款后,还要集会推举代表,为会议作些必要准备、预购船票等等,这期间少说又需5~7天时间。马林、李达等是不会不考虑上述情况而作出6月20日开会的安排的。

四、外地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及其代表们多是学生和教员,李达等人不会预定在未放暑假的六月间开会

当年,在参加“一大”的十名外地正式代表中,有五名学生:张国焘、刘仁静、王尽美、邓恩铭、周佛海;四名教员: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陈公博(兼职教授)。另外,建党时最有威望的陈独秀、李大钊两人,一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兼大学预科学校校长,一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兼教授。他两人虽未出席“一大”,但各地同志,特别是上海发起组在预定开会时,还是盼望他们参加的。如对陈独秀,直到临近会期,还“函电交驰,催促他……速来出席”。^⑦

集中这样一些分散于各地的在校学生、教员和教育界知名人士秘密开会,一般讲会期都应安排在学校放假之时,不可能仓促地把会期定在当时一般学校尚处于期末考试期间的6月20日。

李达等人从1920年起即开始准备这次会议。他们对会议筹备工作,包括一些细节的考虑都是细致、慎重、周密的。例如:为安排代表们的住宿,假借“北京大学暑期旅行团”名义,租用了学校主办人不爱过问政治的博文女校放暑假空出来的校舍,同时为融洽与校方的关系,防止校方将校舍另租他人,“讲明仅住一个月,却很慷慨地付了三个月的房租”^⑧;还选择地位、身份相当高的同盟会元老李书城的公馆作为会场,以利掩人耳目,保证会议顺利、安全。很难相信他们会在筹备开会至关重要的一环——预定开会日期上有所疏忽。当时学校放暑假的月份同现在大体一致,基本在七八月间。假“北京大学暑期旅行团”名义,利用博文女校放暑假后的校舍,这两点也可以说明李达等人的各项安排一直是按暑期开会进行准备的。既然是按暑期开会在做准备,那么“一大”预定的开会时间也只能在七八月间,而不会安排在暑假之前的6月20日。

此外,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中,还有一些少年中国学会会员,如李大

钊、张国焘、刘仁静、毛泽东、施存统等，其中李大钊还是该学会的主要组织者。而该会年初即定“七月在南京开国内、日本及南洋的会员全体大会”（后于7月1日至4日召开——笔者注），并公开登载消息，通告各地。这些情况，李达等人也当了解，也当在预定“一大”会期时予以考虑，而不至于使召开“一大”时间与上述会议时间相冲突。

五、从多年来“一大”代表回忆看，当年预定开会时间也不是6月，而是放暑假的7月间

现在所见“一大”会议参加者回忆中，凡忆及会议预定开会时间的，除张国焘一人外，都是讲的“7月间”，或“暑假”^⑨。张国焘虽有“六月中旬”之说^⑩，但对照同是北京代表的刘仁静回忆及其他多种资料，可以认为，他或者把农历时间误记成了公历，或者是根据建党纪念日——7月1日而粗略推算出的日期。实际上，他应与另一位北京代表刘仁静一样，即“一九二一年暑假”中才知道“最近要在上海”召开党的“一大”。

李达的回忆值得格外重视。他在早期回忆中谈到“一大”预定开会时间和实际开会日期时都讲是“7月1日”^⑪，当然就“7月1日”这一时间本身而言，肯定是误忆。但他的记忆可以说明“一大”的预定开会时间和实际开幕日期是同一天，并不存在会议误期召开之事。在“一大”代表们多年来数十篇或略或详的回忆材料中，我们也没有看到这次会议误期月余的记载。

原载《党的文献》1993年第1期

注释

- ① 叶永烈：《红色的起点》，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33页。
- ② 同上，第235页。
- ③ 同上，第240页。
- ④ 李达：《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见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选编：《“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6页。
- ⑤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一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132页。